

西部大开发决策中为何没有提出GDP指标

2000年4月,在“十五”计划重点调研课题汇报会上,我代表国家计委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想法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同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几种方案都摆了出来,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为“10+2”,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考虑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会议还确定,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予以照顾。

后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纳入了参照享受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范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海南省原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六个县和湖南省张家界市的一区

一县等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般都要提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目标。但是在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却没有出现GDP指标,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GDP是用来衡量、监测经济活动的总量指标,在所有统计数据中最受瞩目,曾被许多经济学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GDP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统计的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产品,没有交易的产品是不算在GDP内的。同时,GDP统计的是“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对非生产活动,如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发展的内容,也不能完全反映出来。而这些没有反映的内容,很多恰恰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GDP统计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成果,一般来说是按年度或季度计算。各级政府在任期内提高GDP水平,是否牺牲了长期利益,是否考虑了可持续发



2001年8月5日,建设中的青藏铁路。

出了这种苗头。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工工业不能一哄而上,避免发生新一轮重复建设。

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实现西部大开发目标,需要我们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单纯追求GD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全面发展上来,对西部地区已经出现的大上加工工业项目的热潮应当降温。在规划指标的选择上,我们考虑,是否可以不提出GDP目标,以免各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可持续发展,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或上一些没有市场和竞争力的项目。

经过多方论证和认真测算,最终我们在“十五”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中提出了一个5年、10年和50年的战略安排。这个规划虽然没有对东西部在缩小GDP差距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但在更广阔、更全面的领域体现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要求。

(摘自《瞭望》曾培炎/文)

一次调研掀起“浙江农村改革第一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广大群众对农村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1979年冬种时,长城公社狄家斗二队的群众自发在油菜地开始了包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于是,在1980年的晚稻种植中进一步实行“包产到户”。然而,该事件引起的争议很大,甚至有“队长被抓起来了”的传闻,导致全县的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

中共长兴县委对农村改革高度重视。1981年4月初,时任县委书记丁文荣用9天时间,在长城公社狄家斗二队等地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地,丁文荣都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访问、到田间地头看生产现状等方式了解情况。通过调研,丁文荣认为,“统一经营,联产到劳”是最受群众欢迎,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他总结出其有利于提高社员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等10个方面的益处。

4月15日,丁文荣向县委提交了《关于“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4月21日,县委向全县批转了该报告。4月22日,县委办公室以《狄家斗二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情况》为题详

细介绍狄家斗二队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并上报中共嘉兴地委办公室和《浙江日报》。

5月28日,《浙江日报》头版以《联产到劳真灵》为题,刊载丁文荣的5篇下乡日记,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种领导方法是很可取的”。《浙江日报》的宣传和县委的不断教育,极大推动了全县农村改革的进程。8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长兴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落实生产责任制》为题,肯定了长兴县从狄家斗二队开始的“联产到劳”责任制。

《人民日报》在配发的短评中指出:“浙江省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走出办公室,就落实生产责任制问题深入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用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统一县委的思想认识……正确的认识、恰当的方法,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人民日报》的报道不仅肯定了长兴县的农村改革,也使得浙江省的农村改革迅速铺开。长兴县狄家斗二队的农村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浙江农村改革第一幕”。(摘自《党史信息报》长史/文)

曾国藩与李鸿章庆生大不同

同治十年(1871)十月初五是李鸿章的50岁生日,这时的李鸿章是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声势如日中天。为办好李总督的寿宴,成立了由直隶布政使领衔、十多位官员参加的协调班子。提前两天,天津的江安会馆就布置一新,司厨仆役难计其数。生日前一天,直隶总督署内“烛爆如山,敲绣成队”,奢华喜气,下属和部将们轮流向李鸿章祝寿。江安会馆开席招待祝寿的“司道诸将及候补各员”,吃大餐听大戏,“堂下戏台前设十六席,堂上二十一席,左右厢各四席”,主人和客人达260人,加上随从人等,“厥数倍之”,少算一些也有500多人。每张餐桌有服务人员2名,合计一下,餐桌服务员应为90名左右,同时“庖人托盘器幢往来者亦数十人,梨园子弟百人”,此外,会馆外还有警卫兵勇。据记载,这一天江安会馆内外人数不少于1000人,喝酒、听戏之后,又舞灯,现场“人气如烟云,声如雷鸣,目为之炫,耳为之震”。目睹此景,参加宴席的官员赵烈文感叹:“繁盛至此极矣!”(摘自《扬子晚报》李晓巧/文)

触动心弦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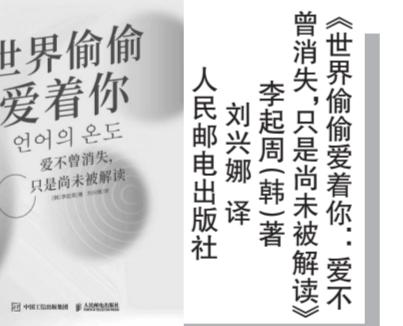
有个词叫作“左右逢源”,指的是仔细地揣度周围的事物与现象,都能找到其根源,也可以解释为日常的一切事物都是学习的源泉。

不久前,在首尔坐5号线地铁途径孔德站时,一个微不足道的场面,触动了我的心弦。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车厢里像下饺子一样挤满了人,我勉强地把自己塞了进去。

我抱着一丝希望环顾四周,没有空位,周围的乘客多半在埋头看着什么,其他人或是打电话,或是跟同伴说说笑笑。不经意间,我瞥见一对坐在老年人专座上的老夫妇,满头鹤发的老爷爷坐在老奶奶身旁,用手机听着新闻播报,边听边情不自禁地应和,“嗨”“哎呀呀”,有些聒噪。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报声与老人充满激情的应和声此起彼伏,瞬间霸占了整个车厢。

坐在一旁的老奶奶把手放在老爷爷的手背上,轻声细语地说:“老伴儿,这么多人呢,咱们戴上耳机听吧。”



老爷爷听后好像意识到了问题,立马说:“好的,老伴儿,我听你的。”

说罢,老爷爷便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耳机,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然后缓缓地塞上耳机。一连串的动作,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勉强与无奈。

看到那一幕的瞬间,那句“老伴儿,我听你的”在我的耳朵里分明变成了这样一句话:“老伴儿,我依然爱你。”

有人说,做对方喜欢的事就是爱,但我认为那是狭隘的爱,不做对方讨厌的事,才是真正的大爱。

爱情的本质都是如此,真正相爱的人不会说谎,不会因逃避问题而闪烁其词,不会因胆怯心虚而推诿搪塞;真正相爱的人在找借口的空隙已跨越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门槛,向着对方大步走去。



的生活标准几乎与宫中无异,不仅需要准备众多运输工具和人力,所经之处,要修建葺尖营、行营、行宫、道路、桥梁等,还要设幔让民众回避,沿途要摆供迎接,花费自然不小。

再有,乾隆皇帝在南巡中讲究排场、追求舒适,因此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滋长了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败。

另外,乾隆皇帝雅好南味亦流连于南方园林,因此有南园北移的设想,兴建皇家园林,此可谓南巡的“副产品”。

乾隆皇帝也时常反思自己的南巡之举,在退位后身为太上皇时,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不以对朕。”看来其已经意识到南巡的负面影响,因此,乾隆之后再无南巡。

宰予到底干了什么

绝对不能把屋子弄得雕梁画栋。用现在的话说,太高调啦。

画家黄宾虹的解释是,宰予的房子太破旧,孔子认为没必要在墙上作画。按此,孔子的批评是从设计和美学的角度出发的,联系“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来看,也说得通。不过,孔子最讲究礼教,君君臣臣父子子,礼制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学生做出格的事。在孔子的心中,豪华装修的罪过比白天睡觉可严重多了。宰予“画寝”应该是他被老师批评的真正理由。

前几天看到一篇论文,颠覆了我的认识。作者提出“昼寝”有误,“昼”应为“画”,两个字长得很像,古人抄写时搞错了,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一字之差,意思大变。昼寝之寝,意为睡觉,是动词,画寝之寝,则是寝室,是名词。画寝,大概就是豪华装修。那个年代,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都有严格的礼教。“诸侯画寝,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垩。”宰予没有官爵,家里四白落地就行,

(摘自《意林》胡一峰/文)

乾隆南巡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按清史学家张勉治的详细估算,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总开支为1890万两白银,每次平均约为315万两白银,而清廷财政收入每年从3250万到6000万两白银不等,因此南巡开支相当于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5%到10%。究竟乾隆南巡对国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南巡是不是导致乾隆朝由盛向衰转折的重要原因?

皇帝手头也会拮据

乾隆皇帝的小金库是内务府,那么,这个小金库里到底有多少钱呢?

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到乾隆六十年(1795),内务府收入总额为6880余万两白银,可以推测乾隆朝六十年的内务府总收入约8200万两白银。此外,户部每年会拨给内务府60万两白银,六十年合计3600万两白银。两项相加,内务府每年的收入在200万两左右。

看似内务府比较富裕,然而内务府有供应皇室消费的职责,实际并不富裕。乾隆三十年以前,皇室支出规模为每年100万到150万两白银,乾隆三十年以后为大约200万两白银。这些常用支出项目包括:每月采办皇室所用食品,赏赐,出巡,祭祀,修缮等。然而,内务府银库有盈余,还要返拨给户部,有时候会有百万余两白银。有时候,皇帝手头

也会拮据。

盛世国力最大的挑战

要估算乾隆南巡对于乾隆朝国力的影响,仅算其在内务府收入中占的比例是不合理的;况且内务府有时候也并无余额,有些有余额的年份也会拨交给户部。因此,要看其在整个户部占的比例。

单从数据本身来看,南巡并非造成乾隆时代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乾隆时期,皇帝炫耀的十全武功才是最为庞大的支出,仅第二次金川之役就耗费6270万两白银,而大小战役相加起来造成了上亿两白银的支出。军事上的冒进和扩张,才是对于盛世国力最大的挑战。

再来看下乾隆皇帝的开销,开支最大宗的并非皇帝的巡游,而是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等。尤其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皇帝更多掏私人荷包来